



土门攻守战



茂县土门河谷土门战斗遗址

1935年4月,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强渡嘉陵江战役后,在涪江地区休整、扩红、筹粮。根据敌人的进逼形势及中央红军的行动,红四方面军制定了《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》的计划,决定西进岷江流域,在岷江上游的松潘、茂县、理番(今理县)、汶川、懋功(今小金县)地区打开局面,策应中央红军北上。

土门,地处茂县东部,是北川西出的战略要地,犹如一条狭窄的咽喉,隘道沿着土门河蜿蜒前行,越过土地岭便能直达茂县。它是岷江与涪江两江上游地区的主要通道,更是红四方面军西进茂县的唯一生命线。然而,在国民党部队眼中,这里却成了他们合围红军的“理想之地”。

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为保住防区,筹划构筑土门封锁线,任命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“剿匪”指挥,第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指挥,共抽调8个团直指土门,企图封锁隘路。4月底,陶凯所部如潮水般涌向土门及土地岭地区,梯次纵深设防,设置了三道坚不可摧的防线,每一个阵地都重叠配备各种火力,多为路易式机枪和迫击炮,形成密集交叉火力网。同时,他们还控制着屯驻军队于干沟附近,以8个正规团并辅以近万地方武装,封锁土门要隘,堵住北川河谷西面关口。在邓锡侯看来,即使红军来攻,他们也能负隅自固,稳如泰山。

然而,红四方面军并未被吓退。为达成“松理茂”计划,红四方面军针对敌军兵力部署,制定作战策略:第一步,南打夺取佛泉山、千佛山、观音梁子,控制北川河谷,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,以吸引和调动川军主力。第二步,突破土门要隘,主力乘胜西进。

红九军二十五师,红三十军八十八师、八十九师,以及妇女独立师等相继进入北川,分兵向佛泉山、千佛山方向运动。5月1日,红军发起攻势,溃敌一部,占领墩上,又夜袭蔡家咀守敌,拔除了敌军据点,并于2日占领东岳宫。3日,红军击溃川军一部,占领了凉风垭,打开了千佛山、佛泉山一线的突破口。4日,包围了从漩坪撤至佛泉山的敌军残部,凭借密林掩护发起进攻,一鼓作气攻上山顶,生擒守

敌大部,占领了佛泉山主峰龙宫殿及其周围的制高点,打破了川军守备北川河谷的计划。5月10日歼敌一个团,占领了千佛山主峰佛祖庙。至此,红军牢牢控制了千佛山、佛泉山等北川河以南的战略要地,使敌人失去了所谓川西平原的“天然屏障”,造成了南取成都的形势,给敌人以极大震动。

向南行动目的达到后,红四方面军立即发起了对敌人土门封锁线的攻击。

红军经过侦察摸清敌情后,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敌人的主阵地观音梁子。5月15日拂晓发起攻击。攻击部署是:先以红二六五团一个营夜间突袭敌主峰阵地,红二十五师两个团担任正面主攻,红二十七师一部和二六八、二六五团迂回敌两侧,实行包抄。

战斗,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。

夜幕低垂,一片寂静。红二六五团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朝着敌人的阵地摸去。当接近敌前沿阵地时,随着一声低沉有力的“冲”字,战士们如猛虎出笼,呐喊着冲向敌人。刹那间,原本寂静的夜色被彻底打破,枪声、炮声、手榴弹爆炸声、喊杀声,震天动地,仿佛要将整个山谷掀翻。仅仅两小时后,红军战士们成功突破敌前沿阵地。红二六三团奉命扼守阵地,坚决阻止敌军反扑。战士们迅速在阵地上构筑起简易的防御工事,牢牢地坚守在阵地上,任凭敌人如何疯狂进攻,都丝毫不曾动摇。

其他部队则乘胜追歼敌人,势不可挡地压向朝着敌阵。只见红旗所指之处,部队如同潮水般迅速推进。在激烈的战斗中,不少同志倒下了,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,但无一人后退。有个营长,始终冲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身姿挺拔,仿佛一把锋利的宝剑,直插敌人的心脏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响,他的腿部中弹负伤,鲜血顺着裤腿流下,染红了一大片土地。但他不顾战友们的劝阻,坚决不让同志们抬下山。他咬着牙,强忍着剧痛,伏在一块石头上,继续指挥战斗。他的声音虽然有些虚弱,但充满了力量,每一个指令都清晰而坚定,让战士们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。红二六八团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小司号员,他身矮体弱,在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攀爬着。爬到半山腰时,他累得气喘吁吁,脸色苍白如

纸,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,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,呼吸急促而紊乱,仿佛拉风箱一般,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,湿透了他的衣衫。这时,一个高个子战士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,他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,将小司号员背在背上,继续跟随进攻部队前进。

在嘹亮的号声中,红军指战员们如虎添翼,士气大振,纷纷冲向敌群,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。战士们挥舞着手中的大刀、长枪,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刀光剑影闪烁,鲜血飞溅,喊杀声震天。每一次碰撞,都伴随着一声惨叫;每一次挥砍,都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胜利的渴望。

鏖战至中午时分,天空中突然传来了敌机的轰鸣声。几架敌机如恶狼般临空投弹,企图对红军部队进行轰炸。山谷中多林木岩石,部队易于隐蔽,敌机难以投准目标。炸弹在山谷中爆炸,扬起阵阵尘土,但并没有对红军部队造成太大的伤害。有一架看上去很小的敌机,为了寻找目标,竟然在红军阵地上空超低空飞行,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。战士们纷纷举枪迎击。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员郑维山,一把从通信员手中接过小金钩马枪,熟练地端起枪,瞄准敌机,果断地扣动了扳机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,一颗子弹如流星般射向敌机。不知是被击中还是飞机发生故障,那架敌机发出一阵惨叫,如同受伤的野兽一般,在对面一座山上坠毁,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。其他敌机见状,吓得惊慌失措,狂轰滥炸一阵之后,便从山头掠过,朝着南方狼狈地飞去。

午后2点左右,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,终于攻占了观音梁子主阵地。敌人不甘心失败,连续发起反击,企图夺回阵地。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,但都被红军战士们击溃了。红军战士们如同坚固的磐石,坚守在阵地上,让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化为泡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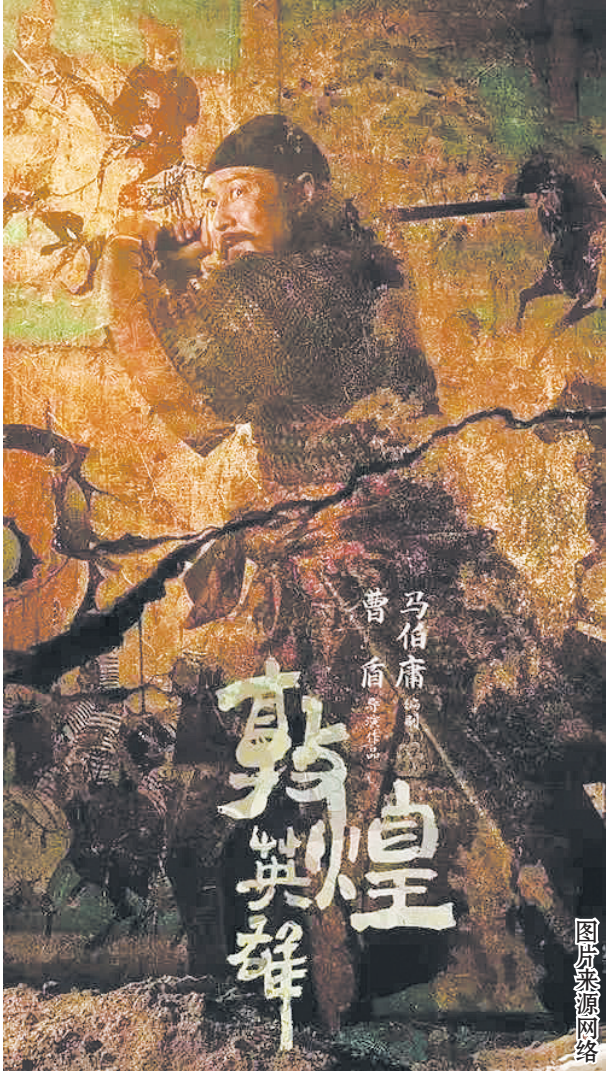
16时许,红军兵分两路攻取土门。一路翻越冷水坪,出大沟口;一路自老君山直指雨淋磴。这一攻势如同伸出两条铁臂,势不可挡,把包括土门在内的敌军右翼阵地团团围住。这时,占领墩上、桃坪等地的红军部队也赶来支援,形成了南北夹击敌人之势。那场面,如同天罗地网一般,让敌人无处可逃。

敌人的防线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,迅速被击破。红军战士们迅速分割包围敌人,将敌人分割成一个个小块,使其各不相顾,纷纷乱窜。

战斗持续到16日早上,红军终于全部摧毁敌人土门封锁线,陶凯率残部狼狽逃窜。整个北川土门通道掌控于红军手中。

蒋介石的参谋团十分恼火,严电刘湘赴红军立足未稳进行全线总反扑,限期夺回佛泉山、千佛山阵地,堵截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。川军邓锡侯、孙震、王缙绪等收整30多个团,分别从绵阳、江油、绵竹、灌县等地压过来。留在佛泉山、千佛山一线坚守阵地的红四军、三十一军、三十三军,以坚韧不拔的意志,凭险据守,与敌人浴血拼搏。7月中旬,守卫阵地的红军完成牵制和掩护任务,才完全撤离千佛山全线阵地。

从4月底至5月22日,红四方面军歼敌7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,彻底粉碎了土门封锁线,胜利进入了岷江上游地域。(来源:州委党史研究室)



■代亮

河西沦陷,吐蕃苛政,沙州百姓隐忍求生,张议潮暗中蓄力,归义军光复故土——电影背景的每一个点都大有可为,可《敦煌英雄》偏偏绕开了这些。它借来“归义军”的壳,却把历史碾成一条悬浮的公路;它请出敦煌,却让敦煌沦为魔幻闯关的布景。四人送信小队一路被追杀,最终靠神迹翻盘,这不是归义,这是魔改;这不是英雄,这是虚无。于是,真正被辜负的,不是某个角色,而是敦煌。

在我看来,《敦煌英雄》从本质上就不是一部历史片,只是一部借晚唐归义背景包装的魔幻公路冒险片。其对于安史之乱后河西沦陷、吐蕃苛政虐民、沙州百姓隐忍求生、张议潮暗中蓄力、起兵光复故土的核心脉络一概浅尝辄止、模糊带过。它仅仅借用了“归义军”“沙州复国”“千里赴唐求援”的历史外壳,掏空了所有的时代与精神内核,将厚重的晚唐乱世背景,变成一场悬浮的闯关冒险舞台。

更进一步说,电影所谓的小队设定可以放到任何同类型的公路片中,主创并不走心,他做的只是把模板嵌套进敦煌背景中,这也直接导致影片的剧情逻辑混乱。片中的反派手握攻城主动权,却全程对主角们穷追不舍,无视主战场的战事推进。这种刻意制造冲突、为了冒险而强行追杀的设定,没有半点军事逻辑与战局常识,整部影片的戏剧冲突完全依靠主创的主观臆断强行支撑,一旦剥离这套强行制造对立的无脑追杀套路,整个故事便不成立。

叙事逻辑的错位,最终造成影片英雄内核的彻底偏移,让真实厚重的历史英雄,沦为虚无空洞的影视符号。主角们的冒险从头至尾都是在编剧可控的舒适圈里,却承载不了历史上的归义军,“归义”二字所蕴含的静默而漫长的忠诚。公路冒险的紧张与归义军的历史悲壮之间,存在着本质的错位。影片越是把重心放在生存冒险上,就越是远离了那个真正打动人的历史内核;因此找援军也好,找所谓伏火雷也罢,整部电影从中段起就失去了灵魂。

电影到这里,我尚觉整个故事是散的,有些艺术加工,但还没有离谱到一无是处的地步,我琢磨着电影怎么收尾:或是复刻历史中归义军自力更生、绝地自救的坚韧,或借反派疏漏完成战局反转,或让小人物用牺牲诠释平凡英雄的大义。但最终结局彻底打破所有合理预期,把荒诞感推向顶峰——类似《魔戒》亡灵大军降临的模式,以魔幻神迹强行扭转战局,靠信念创造奇迹的唯心设定,令人目瞪口呆。这种不伦不类的魔幻结局,照搬西式奇幻套路,硬给一段真实悲壮的中国历史史诗,套上了玄幻开挂的烂俗外壳。

由此,《敦煌英雄》的问题已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失误,而是整套创作理念的系统性错位。电影虽然在服装道具上下了功夫,但精良的工业外壳撑不起跑偏离谱的创作构思。马伯庸擅长的“小人物、大历史”叙事配方,在之前的很多影视剧中屡试不爽,但这套配方核心是:小人物的真实鲜活、历史背景的扎实落地、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深度绑定。而在本片中,彻底跑偏的创作,让所有人物都失去了真实底色,他们的挣扎、坚守、牺牲不再贴合乱世家国的道义,只剩服务魔幻冒险剧情的工具人。

对于晚唐归义军这段可歌可泣、独一无二的悲壮史诗而言,平庸的改编尚且可惜,而这种本末倒置、胡编乱造的虚无英雄,辜负了敦煌,也远比平庸更令人反感。

《敦煌英雄》：借壳归义，失魂敦煌

圩乡月色最归人

——读《江南归处》

■徐晟 文/图

“江南的风景是水写的。”只这一句,人就被带进一片潮湿而明亮的光阴里。时国金的《江南归处》写的正是这样的水:圩乡的水,塘沟的水,月光浸透的水,也是人心里一流不干的归处。

全书分四辑,从“月光、鱼和圩乡的水”写到“隔着时光的芬芳”,从“雪落荷塘”的亲缘生死写到“物言春秋”的敬亭、宛溪与宣城文脉。它记自然风貌、岁时风物、渔耕生活、民俗传统,也记谢朓、李白、梅尧臣留下的山光水影,记革命往事、历史遗迹与乡土伦常。看似是日常札记,实则是一个儿子、一个村人、一个后来在远方回望的人,把故土一页页摊开在灯下。

最动人的,是书里那种不喊痛的深情。写父亲,他说:“平时有父亲在,不觉得轻重,走了,就觉得失去了一座大山。”这句话像钝刀子,慢,却准。人到中年,谁都懂:父母不是山里的风景,而是山本身;山在时,我们忙着看云,山没了,才忽然明白路从哪里起,又在哪儿断。作者写“我的那些奶奶”,写老芋头的“山海经”,写没有绽放的花朵、生死一瞬,都把家族伦理落到烟火细处。它没有把乡村写成田园标本,也没有把亲人供成牌位,而是让他们带着汗味、泥味、鱼腥味和旧脾气活在纸上。读到这里,我想起自家饭桌上那只缺口粗瓷碗,想起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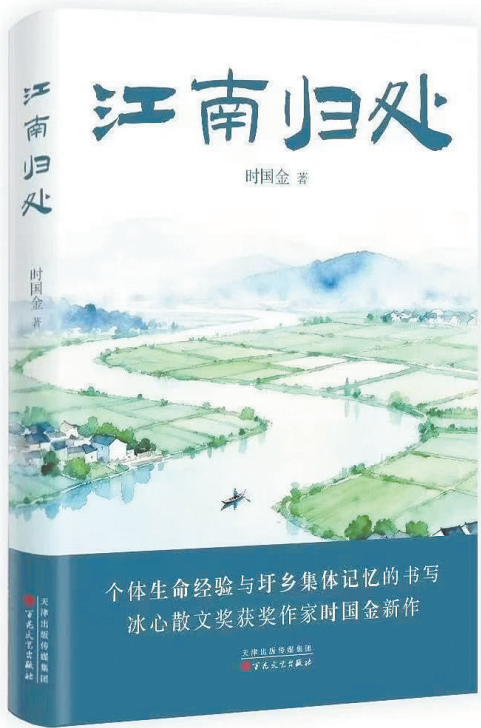
辈重复千百遍的叮咛;原来所谓乡愁,不是风景多好,而是有人曾把你放在心上。

书中最耐品的,是“水”带来的思考。圩乡给了作者鱼、稻、荷花、橹声,也给他出走的路。他说:“人生是从一场村庄向城市的出走,又一次从城市向村庄的回望。”这句话可作全书的骨。村庄是母体,也是童年;城市给人灯火,也给人失眠。作者并没有简单赞美归隐,也没有否定远方。他写“捞田缺”的雀跃,写银亮的鲫鱼在网兜里活蹦乱跳,也写鲤鱼错过秧田当龙门,几天后“永远告别那一汪清澈的沟水”。这是多轻的笔,多重的命意:人何尝不是一条条鱼,顺缺口而下,争那一点活水;有的跃过去,有的搁浅在稻田的泥里。生态变了,沟渠瘦了,村庄折叠进楼群与车流,可记忆偏要固执地返青。

写宣城一辑,又可见地域文化的厚度。李白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,作者隔着千年替我们接住那点意气:山晚望晴空,双桥落彩虹,北楼临风,诗心不老。可贵在他不把古迹写成导游词,而把谢朓、李白、梅尧臣请回水边,让诗与人重新照面。于是敬亭不只是一座山,宛溪不只是一条水,它们像老家的门楣,旧了,仍认得归人。这样的文脉不是高阁上的灰尘,而是落在乡音、节令、酒气、柳色里的热气。

读罢合卷,心里会浮起那片“白帆点点”的水。

书评



它未必是我们每个人的江南,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
的圩乡:有母亲的瓦房,有父亲的沉默,有清晨的沟水,有暮色里的犬吠。时代催人上路,幸好还有这样的书,替我们留住一间可回头的茅舍。愿我们走过半生,仍能认得自己的倒影;愿水面起风时,有人温酒,有人唤乳名,月色落在塘上,一落,便是归人。